



1911年，汉口铁道旁的清军军营

伍廷芳和唐绍仪坐到了南北议和的谈判桌前

胡汉民吃惊地发现国库之内仅有银元十枚

辛亥年九月二十三日（1911年11月13日），袁世凯乘坐专列自湖北前线返回北京。当袁世凯走下火车的时候，“一队手持长剑、威风凛凛的卫兵紧随其后”。袁世凯回到北京，取代庆亲王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，任命桂春重新担任仓场侍郎，任命赵秉钧为民政部大臣，北京城纷乱的秩序终于渐渐平静下来。戏园又得到警厅的通知，可以开演夜戏，广德楼、天乐园最先恢复了夜戏，前门大街的夜市也恢复了，沉寂的街巷，一点一点地恢复了正常。

辛亥年十一月初六（1911年12月25日），圣诞节，细雨如织的上海三马路（今汉口路）码头，杨士琦所说的广东人孙中山走下悬挂着革命军旗帜的“江利轮”，回到了巨变的祖国。等候他的，不再是帝国的捕快，而是手摇欢迎旗子的民众。

自此，两位在幕后遥控国家走向的人都完成了各自的亮相，开始了面对面的博弈。

1911年10月14日《纽约时报》披露了一封孙中山给金融家的信件，信中说：我们希望你们积极寻求愿为我们提供资金的金融家。如果他们愿意提供上述贷款的话，请尽快通知我们，他们愿意以什么条件和什么方式成交。一旦从贵处确知细节，我即按照这些金融家的意愿展开工作。

胡汉民回忆，孙中山两手空空地就任临时大总统后，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，急向中央索饷，孙中山大笔一挥，拨二十万元救急。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手持总统批示，前往财政部提款时，发现国库之内，仅有银元十枚。

只有“革命精神”，既无法打仗，也无法立国。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开始谋求举借外债，与清廷的借债方案区别只在于，前者是以川汉铁路为抵押，而临时政府则准备以汉冶萍（即汉阳铁厂、大冶铁矿、萍乡煤矿）公司抵押。日本人更加敏锐，打算在诸国银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然而，这一计划因遭到参议院和独立各省，以及公司股东大会一致反对而宣告流产。此后，孙中山又谋求以租借满洲为条件向日本贷款，因谈判破裂而再度搁浅。

上海英租界 一场驴唇对马嘴的谈判

这是驴唇与马嘴在一起谈判。如果这样的谈判能够成功，那么天底下就没有办不到的事了。在双方看来，袁世凯的君宪目标，和孙中山的革命目标，都显得不切实际。

就在袁世凯成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同一天，孙中山的革命军队被冯国璋率领的帝国军队毫不客气地逐出汉口，并在汉口燃起一场大火，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这座繁华的都市烧成一片废墟。革命党内部多数认为孙中山理想太高，并不现实。于是，为驴唇与马嘴之间找到共同语言，就成为双方共同的任务。黄兴在给胡汉民和汪精卫的信中表示，如果和议不成，“自度不能不下动员令，唯有割腹以谢天下”。

正式谈判会场定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市政厅，这幢建筑现在位于南京路上海市第一食品公司对面，原是一座红楼，现已经过拆盖。场面上的谈判，似乎成为一种形式，大局，已经在赵凤昌的惜阴堂里决定了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南方革命党谈判代表伍廷芳，身着中式长袍马褂参加会谈；而清廷命官、一品大员唐绍仪，竟然剪了辫子，身穿西装，打着领带，外套呢制大衣，头戴法式皮帽参加会谈。

唐绍仪暗渡陈仓 袁世凯出离愤怒了

袁世凯制订的规则，革命党不喜欢，就在双方陷入僵局的时候，他们以一种冒险的方式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

12月29日，南京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孙中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。

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（1912年1月1日），中华民国元年元旦，星期一，孙中山身穿黄褐色呢质军服，头戴嵌有红边的军帽，从上海哈同花园乘马车到达上海北站，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行前，专门嘱咐沪军都督陈其美：“我辈革命党，全不采仪式，只一车足矣。”沪宁线上，每到一个车站，都会看到上万民众集合在那里，目送孙中山通过，高呼“共和万岁”口号，声闻数里。当晚十一时，就职典礼在总统府西暖阁举行。孙中山举左手高声宣誓：倾覆满洲专制政府，巩固中华民国，图谋民生幸福，此国民之公意，文实遵之，以忠于国，为从服务，至专制政府既倒，国内无变乱，民国卓立于世界，为列邦公认，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。谨以此誓于国民。中华民国元年元旦。孙文。

这一天，海圻号巡洋舰在巴罗港举行了隆重的易帜仪式。全舰官兵军容严整，列队于后甲板；首先降下黄色青龙旗，然后升起红黄蓝白黑五色旗。

唐绍仪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的做法令袁世凯出离愤怒了。尤其当他得到孙中山已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时，大骂唐绍仪出卖了他，同时命令冯国璋、段祺瑞等四十余人联名电请内阁代奏，竭力

要求维持君主立宪，反对共和政体，如以少数人的意见采用共和政体，必誓死抵抗。为了安抚袁世凯，使这次冒险安全着陆，在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，按照各地代表的会议决定，孙中山特别发电报给袁世凯，明确表示自己只是“暂时承乏，而虚位以待之心，终可大白于将来”，希望袁世凯“早定大计，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”。

唐绍仪派人抵宁 他要拉住南京临时政府

孙中山及时的表态，让袁世凯悬着的心踏实了许多。为了让南京临时政府进一步认清自己的身价，同时赢得时间重新部署兵力，袁世凯决定让风向标的方向变一下。他通过谈判代表向南方透露了这样的消息：朝廷对优待办法不满，谈判突然在优待清室这一最后环节上陷入僵局。

在孙中山就职这一天，唐绍仪在左右为难的处境中，让冯耿光给袁世凯发去电文，辞去议和代表之职。但他并没有离开上海，北南对话仍然因他的存在而藕断丝连。只是由公开谈判，转为私下协商。唐绍仪心里担心南方会因失望而退出谈判，派冯耿光和章宗祥前往南京，他要拉住南京临时政府。

冯耿光从上海出发的时候，铁路交通的秩序尚未恢复正常，唐绍仪请沪军都督陈其美为他们办理专车。当时，沪宁线刚刚开始通车，每天只有一个车头来往行驶，所谓专车，实际上只是一个火车头挂了一个三等车厢，车厢内凌乱不堪，行车手续也不完备。冯耿光趴在车窗上，看窗外的景物从他视野里一一闪过。途经的小站冷冷清清，连个打旗员也没有。偶尔有南军的士兵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闲散地行走，多为粤、浙两军，他们的军装已经破旧，其中粤军士兵的军章只是一块白布，上面写着“某军某协”字样。天已隆冬，大部分士兵还穿着单衣，在风里瑟缩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

火车喘息着走了十个小时，才从上海慢吞吞地抵达南京。当他们被临时总统府派来的人送到一家旧式的小客栈时，已是深夜。冯耿光和章宗祥疲惫至极，刚倒在雪白的被单上，就沉入了梦乡。早晨醒来时，总统府的车正等在楼下。

一个冷酷的现实 即使打明牌南方也难取胜

中午时分，冯耿光、章宗祥与孙中山、胡汉民围在小方台的四周吃饭。饭菜是简简单单的四菜一汤，广东家乡的风味，有香肠和咸鱼，孙中山、胡汉民、冯耿光三个广东人和章宗祥这个浙江人吃得津津有味。饭后，孙中山对冯耿光

说：“我一会儿去检阅海军，我们一齐去好不好？”冯耿光答应了。孙走进办公室，换下身上的长袍，穿上一套中山装，就拉着冯耿光，一起走了出去。

检阅回来，孙中山突然对冯耿光说：“果真和议破裂，我就要督师北伐，你可以和我一同前去吗？”又说：“你在军务里多年了，北方军情总很清楚了，可以谈谈吗？”

孙中山的眼力很准。冯耿光曾经在军咨府供职，对北洋军情十分熟悉。冯耿光想了想，把帝国军队的底牌向孙中山做了概述，然后对孙中山说：“你们南军隆冬天气单衣赤足，连棉大衣都没有，外面罩个空心‘一口钟’，北方天气不比南方，你要大批渡过黄河长途北伐，谈何容易。若真坚持硬做，势必困难重重，心劳日拙。况且以大炮而论，北军最多，南军很少。你们就算有些零星的重火器，用时常出毛病，配备的零件七拼八凑，怎能应急？所以就实力而论，南军远不如北军强。而袁又是个成竹在胸的人，事情未发作前，早已把各方的劲旅抽调布防，准备万一的时候打一阵硬仗。如果和议破裂，兵连阵接，胜败谁属固属预料，然北强而南弱，一经接触，我料初胜必属北军，则南军内部的变化不可不虑。如是则究竟欲和欲战，我看您应当深思熟虑，而后决定之。”冯耿光没有顾及孙中山的反应，接着说：“希望和议成功，一致推翻清室，免得夜长梦多，对共和前途、国家前途皆非福幸。”

孙先生一边听他说，一边默然点头。即使打明牌，南方也难于取胜。冯耿光说出的，是人们不愿说出却又无法回避的现实。

一连串的淘汰赛 袁世凯成“常胜将军”

此时的袁世凯，心情同样是忐忑的。如果南北战争爆发，袁世凯并非胜券在握。战争一旦打响，各种不可测的因素都会出来左右局势。袁世凯当然希望一切都在谈判桌上解决。在谈判桌上借清廷之口提高要价，这一举动无疑是有风险的。谈判是一场心理较量，是一次赌博，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。袁世凯从来不愿在赌场上小打小闹，既然赌，就把全部的政治前途押上去。与朝廷进行的复出谈判，就是一场赌博；如今的议和谈判，也是一场赌博；多年以后的复辟帝制，更是一场赌博。一连串的淘汰赛，袁世凯成为常胜将军。也正是他在赌场上的战无不胜，使他在最终的赌局中血本无归。

节选自祝勇《辛亥年》（三联书店2011年8月版），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，有删节。



1908年，伍廷芳在芝加哥



唐绍仪、段祺瑞、徐世昌合影



1911年，汉口铁路运送伤员的情景